

漢書藝文志與

曾聖益 著

書目文獻論集

藝文志卷第十

班固 漢書三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詡注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

李奇曰微不顯之言也

七十子喪

而大義乖

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

故春秋分為五

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鄭氏夾氏也

詩分為四

韋昭曰謂毛氏鄭氏齊韓氏

易有數家之

傳戰國從衡宣偽分爭

師古曰從音子客反

諸子之言紛然散

亂

師古曰散離也

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師古曰燔燒也秦謂

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燔音扶元反黔音其炎反又音琴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

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鉅簡脫禮壞樂崩

師古曰鉅大也禮壞樂崩師古曰

絕散落故簡脫

聖上喟然而稱曰

師古曰喟歎息也音白立反朕甚

漢書藝文志與 書目文獻論集

曾聖益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書藝文志與書目文獻論集 / 曾聖益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102.07

頁；公分（文史哲學集成；643）

參考書目：頁

ISBN 978-986-314-132-7（平裝）

1.藝文志 2.漢代 3.目錄學 4.文集

013.22107

102015086

文史哲學集成

643

漢書藝文志與書目文獻論集

著者：曾聖益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http:// www.lapen.com.tw](http://www.lapen.com.tw)

e-mail:lapen@ms74.hinet.net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七〇〇元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2013）七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 · 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86-314-132-7

00643

摘 要

本書收錄作者近年來研究文獻學的相關論文十二篇，論述的重心在於《漢書·藝文志》與清代文獻學，清代文獻學包含《四庫全書總目》與清人的輯佚工作。

《漢書·藝文志》是現存最早的書目，因其著錄之書目及分類大致依循《七略》，故自鄭樵以下學者多逕稱班固截取《七略》以成《漢書·藝文志》。本書考察劉向、劉歆的校讎工作，《別錄》、《七略》二書的編成撰過程，及班固《漢書·藝文志》對劉歆《七略》之依循與修正，據以論述劉氏父子及班固將其學術觀念付諸目錄書的意義，與班固將其書目載為史志對學術發展之影響。收錄的論文包含：〈《漢書·藝文志》成書淵源論疑〉、〈《漢書·藝文志》著錄義例考辨〉、〈論《漢書·藝文志》未立史類之緣由〉、〈《漢書·藝文志》述論之西漢學術〉、〈「數術」與「術數」之名義辨析〉、〈劉向的校讎工作對經學儒學的影響〉六篇。

考據學是清代學術的代表，清儒因考證之故，重視文獻的蒐集與考辨，《四庫全書》的編纂與古佚書的輯存工作，既與考據學關係密切，亦是清代重要的文獻成就，對後世學術文化影響深遠。本書收錄作者相關論述五篇，包含〈《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十三經注疏》提要疏議〉、〈《四庫全書

總目·詩文評類》論中國詩文評著之特性〉、〈乾嘉時期之輯佚書與輯佚學〉、〈鄭玄《六藝論》輯本十種合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述論〉。

綜合《四庫全書總目》相關論述各篇，可以清楚得見《四庫全書》館臣的學術主張，及其對傳統學術的態度，而此態度影響清代三百年的學術風氣；蓋乾嘉考據學風主要因於不滿意傳統經籍注疏的解釋而建立，輯佚工作本是因考證需要而產生。

本書藉由論述清儒的輯佚工作，以探討其整理文獻的方式與過程，並藉考察《四庫全書總目》對《十三經》注疏的評價與〈詩文評類〉的收錄原則，闡述清儒寓教化經世思想於典籍整理的學術主張。

關鍵字：班固 漢書藝文志 文獻學 目錄學 駁讎 四庫全書 輯佚 藝術

A Research on “Han Shu Yi Wen Zhi” and Bibliographic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book contains twelve philology-related papers recently studied by the author, and focuses on “Han Shu • Yi Wen Zhi” (《漢書 • 藝文志》) and the philology of the Qing Dynasty, including “Si Ku Quan Shu Zong Mu” (《四庫全書總目》) and the Qing people’s efforts in collecting lost records.

“Han Shu • Yi Wen Zhi” (《漢書 • 藝文志》) is the earliest book of bibliography available. Because the contents of “Han Shu • Yi Wen Zhi” (《漢書 • 藝文志》) is roughly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Qi Lue” (《七略》), most scholars after the age of “Zheng Qiao” (鄭樵) acknowledged “Han Shu • Yi Wen Zhi” (《漢書 • 藝文志》) which is written by “Ban Gu” (班固) as the extract of “Qi Lue” (《七略》). This book studies the proofreading work of “Liu Xiang” (劉向) and “Liu Xin” (劉歆), how “Bie Lu” (《別錄》) and “Qi Lue” (《七略》) were written, and how “Ban Gu” (班固) revised “Han Shu • Yi Wen Zhi” (《漢書 • 藝文志》)

IV 漢書藝文志與書目文獻論集

according to “Liu Xin (劉歆)’s” “Qi Lue” (《七略》). Based on the study above, this book elaborates on the value of the Liu father and son putting their academic concepts into a book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influence of “Ban Gu” (班固) recording their book of bibliography in history. The six papers collected in this book are: “The Background of How Han Shu · Yi Wen Zhi was Written” (〈《漢書·藝文志》成書淵源論疑〉), “The Study on the Editing of Han Shu · Yi Wen Zhi” (〈《漢書·藝文志》著錄義例考辨〉), “On Why Han Shu · Yi Wen Zhi was not Classified into the History Book Category” (〈論《漢書·藝文志》未立史類之緣由〉), “The Xi Han Academic Achievements Elaborated in Han Shu · Yi Wen Zhi” (〈《漢書·藝文志》述論之西漢學術〉), “Discrimination of ‘Calculation Mathematics Technology’ And ‘Metaphysics’” (〈「數術」與「術數」之名義辨析〉), and “The Influence of Liu Xiang’s Proofreading Work on Classical Study And Confucianism.” (〈劉向的校讎工作對經學儒學的影響〉)

Textual criticism is the mainstream of the Qing Dynasty. Because the Qing scholar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llec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literature, the compilation of “Si Ku Quan Shu” (《四庫全書》) and the recovery of lost ancient books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extual criticism, but also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Qing academic records, leaving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academic culture thereafter. This book collects five related papers by the author: “The Key Points of ‘Shi San Jing

Zhu Shu' Collected in 'Si Ku Quan Shu'"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十三經注疏》提要疏議〉), "The Features of Criticism of Chinese Poetry in 'Si Ku Quan Shu · Shi Wen Ping Lei'"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論中國詩文評著之特性〉), "Lost Literature And its Study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乾嘉時期之輯佚書與輯佚學〉), "Ten Proofreading of the Collection of 'Liu Yi Jing' by Zheng Xuan" (〈鄭玄《六藝論》輯本十種合駁〉), and "Alternative Elaboration on 'Xu Xiu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述論〉).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the related elaborations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四庫全書總目》), we can clearly see the academic viewpoints of the editors of "Si Ku Quan Shu" (《四庫全書》),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raditional academy. And these attitudes influenced the Qing academy during the dynasty's three-century reign. Because textual criticism of Qian-Jia period comes from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riticism of ancient classics, the recovered edition of the classics arose, in turn.

By looking into the criticism by "Si Ku Quan Shu Zong Mu" (《四庫全書總目》) on the comments on "Shi San Jing" (《十三經》), and the collection rules of 'Si Ku Quan Shu · Shi Wen Ping Lei' (〈四庫全書·詩文評類〉), this book elaborates on the Qing scholars' academic viewpoints that education lies in the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literature. Meanwhile, through the Qing scholars' recovery work, this book also deals with the process and approach that they adopted in rearranging literature.

VI 漢書藝文志與書目文獻論集

Key Words

Ban Gu, Han Shu Yi Wen Zhi, Textual Criticism,
Bibliography, Proofreading, Si Ku Quan Shu, Recovery, Arts

趙 序

凡是研究文史相關學術的人，一定都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就是必須搜集大量的圖書資料，或購置，或贈送，或影印，即使不到汗牛充棟的境界，至少也得「四顧無非書也」。這是因為文史研究離不開書本，一個人沒有書，也許還是可以從事「創作」，但絕對談不上「研究」。雖然現代社會裡，公立圖書館林立，個人沒有必要再貯藏大量圖書，佔用有限的居住空間。再者透過網際網路查詢資料庫、下載電子書也都非常方便，書本似乎已經逐漸失去其重要性了。然而「電子書」也還是「書」，其本質與代代相傳的紙質圖書，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也就是說：研究文史學術，終究是離不開「書」這個基本條件。而廣義的書，就是文獻；研究、處理文獻本身相關問題的學問，就是文獻學。

文獻學在古代又稱為斟（案：「斟」通作「校」，先師王叔岷先生指出：校字之本義為「木囚」，與校正書籍之義無涉，應用本義為「平斗斛量也」的斟字）讎學，這是由於從事整理文獻，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得到一個文字最正確、內容最可靠的本子，以做為進一步研讀的基礎，而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經過斟讎的過程，漢代劉向稱之為「讎校」。程千帆教授曾在〈校讎廣義敘錄〉一文中，詳細討論了「校讎」一

詞的涵義，結論認為：校讎學應該包括校勘、目錄、版本、典藏四個部分。除了辨偽、輯佚之外，程教授的觀點實際也已包含了文獻學最主要的幾個領域，足以說明「校讎學」與「文獻學」是異名同實的。然而在現代語境當中，「校讎學」或「輯讎學」，都遠不如「文獻學」來得明確易懂，本文也因此仍然採用文獻學一詞。

文獻學是一門非常古老的學科，與其相關的歷史記載，東周初年已經出現。孔子的八世祖正考父，在宋國擔任上卿，曾經到周朝太師之處，校理〈商頌〉，凡十二篇。正考父的工作，應當已涉及文獻學中的版本、校勘，可惜歷史記錄並未詳言。孔子本人也是非常注重文獻的，爲了教學與研究的需要，曾整理過六經，並且曾爲了不能深入研究商代的禮制，而發出「文獻不足徵也」的感嘆。也因此有人主張孔子就是歷史上最早的文獻學家。重視文獻的收集、考證，是孔門治學的傳統，例如「四科」之一「文學科」的第二名一子夏，也曾留下因訂正「晉師三豕涉河」之誤而形成「魯魚亥豕」成語來源之一的美談。可知當時的「文學」不但是廣義的，而且也包含文獻學在內。從春秋、戰國以後，文獻的發展愈來愈豐富而多元，文獻學家也人才輩出，到了漢代，以劉向、劉歆父子爲代表，文獻學已然逐漸成型，並成爲學術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

本書是曾聖益教授有關《漢書·藝文志》及書目文獻學研究的論文集。曾教授是一位甚具潛力的學者，先後受業於喬衍琯先生、吳哲夫先生、葉國良先生等名師門下，在臺大就讀研究所博士班期間，其傑出表現就已廣受師長們的肯

定。畢業後多年來一直以經學、文獻學及學術史相關研究爲主要範圍，發表成果也頗爲豐碩，本書即是其最新力作。

除附錄外，本書收入了 12 篇論文，從研究主題來看，包括了目錄學研究 8 篇、輯佚學研究 1 篇、四庫學研究 3 篇，可說是涵蓋了文獻學的主要範疇。由於曾教授目錄學根柢深厚，往往能從目錄學出發，探討學術史問題，而言人所未言。例如〈「數術」與「術數」之名義辨析〉一文，發現漢代「數術」與「術數」二詞並存，同時使用，然其指涉不同，學者往往混淆，甚至視爲是同義詞。曾教授據《漢書》本文及先秦典籍之記載，比較考辨，指出《七略》之「術數」應屬誤用，作「數術」爲是。又如〈古代藝術觀念與唐宋書目藝術類的內容〉一文，從歷代書目的記載來看，宋代以前「藝術」一詞是廣義的，方技、數術均包含在內，與後來專指書畫舞樂不同，而與小學密切相關的書法，也在宋代以後由經部移入子部，反映書法已從認字爲基礎的經學附庸發展成以技藝爲主的藝術表現形式。再如〈論《漢書·藝文志》未立史類之緣由〉一文，訂正學界習以爲常，認爲《漢書·藝文志》是繼承《七略》而來，《七略》未立史部，是因爲當時史書太少，不能單立一類的說法，而是劉歆、班固當時尙無「史學」觀念，故對於史籍著述，考其著作形式，則或同於《尚書》、《春秋》、《左傳》；考其著作目的，則或同於諸子，雜亂而無所歸。再者由於司馬遷、班固志在承續《春秋》，故以《史記》屬春秋類，其他近於《史記》者，亦以相同方式安排。凡此，都是將文獻學上習見的定論，加以翻案或提出新解，充分發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精神。其他各

篇也多有創見，極具參考價值。

筆者忝爲曾教授博士班的學長，又是文獻學的同行，承曾教授力邀，爲他的這本新書寫序，於情於理，均不容推辭。惟因近來公私瑣事紛冗，難以沈定心境，精心撰構。只能略爲談談我對文獻學及閱讀本書的想法，不足爲本書生色，謹就教於曾教授，也盼望讀者諸君指正。是爲序。

趙飛鵬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19 日，於臺灣大學中文系

序 言

接觸「目錄學」，從我進入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班就讀開始。碩一時，選修喬衍琯老師的「目錄學」，課堂上只有王書輝和我二人。第一次上課，老師問我為何選修這門課，我瞠目不知所對，勉強說：「想從這裡學到撰寫論文的基本材料。」喬老師笑答：「這只要看看工具書手冊和論文索引就可以了，不用來選目錄學。」當然，當時的我不太相信的。經過一學期的學習，我知道「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固然是研讀「目錄學」的目的，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才是這門學問的內涵所在，也是歷代目錄學家極欲闡發的宗旨。

喬老師上課以《四庫全書總目》的四十八篇類序為教材，老師先講授「史部」和「集部」，而後由王書輝和我輪流嘗試講解「經部」和「子部」。剛開始講解時，我每次得用一、二天去準備一篇數百字的類敘，從文字逐字解讀開始，到類敘標舉的門類主旨，涉及的代表學者及闡述的學術流變。但上課仍常常不知所云，時而失之簡略粗淺，時而流於駁雜無根，但老師總在我講完之後悉心補充，並指引閱讀相關的書籍。一學期下來，我詳讀了《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及以下的各種書目，並研讀各部正史的〈儒林傳〉、〈文苑傳〉、〈道學傳〉及書目中著錄其著作的學者傳記，《漢志》、

《隋志》的大小序及《四庫全書總目》的類序也幾乎成誦。清人金榜有云「不讀《漢書藝文志》，不可讀天下書」，我略知學問門徑，即從選讀喬老師這門「目錄學」開始，而讓我企圖深入去探討學術流變的，即是《四庫全書總目》的四十八篇類敘。其後並以《四庫總目經部類敘疏證及相關問題之研究》為題，在吳哲夫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碩士論文。

跟著喬老師和吳老師讀書作學問是件極辛苦的事。喬老師注重原始資料的收集考辨，在分析比較之後，才能有結論，大有「未讀天下書，不可妄下雌黃」之意。吳老師則注重對文獻的體會、解讀及闡釋，要能提出自己的見解，發表自己的看法。因此，在研讀及撰述各篇論文的過程中，我一方面要求自己能不錯過相關的資料，一方面嘗試提出自己的觀點，但常常我自認為是創見的，在稍後看到的前人論著中，已有闡述，挫折之感不免油然而生，但研習既久，亦不無若干心得。

很幸運地，在剛進入學術研究之門的碩士班期間，能跟著喬老師與吳老師學習，老師不厭其煩地指正我論述的不足和缺失之處，也不時給我肯定和鼓勵，這些教導不僅為我奠立書目文獻的基礎知識，開展我的典籍視野，啟發我研讀傳統文化和學術思想的渴望。同時也訓練我讀書的耐性和積極訪求佐證材料的習慣，成為支持我從事文獻整理和學術研究的力量。

碩士班畢業後，我於民國八十五年進入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先後跟隨王叔岷老師修習「斲讎學」，跟隨葉國良老師研讀「石刻學」，從斲勘考證中體會典籍蘊含的文

化內涵，及文獻工作的精微細膩之道。葉老師藉由漢魏碑誌的考訂及歐陽修《集古錄》的證補工作，指導同學研習禮儀器物及典章制度。此不僅讓我將文獻知識應用於考證斲鐸工作，同時學習嚴謹細密的文獻分析與判斷原則；亦使文獻學跳脫單純的書目簿錄及版本文字的斲勘工作，而與傳統的禮制習俗結合，並以典章制度及禮儀習俗作為典籍斲鐸及闡釋的依據。在斲鐸同時，學習藉由禮儀節次與典章制度建構歷史現場及文化情境，以考察古代學者的社會活動及生活方式，體驗其詩文著述中蘊藏的生命情懷。我之能夠體會文獻材料中蘊含的豐富文化，自問學於葉老師開始；能將文獻工作提升至學術文化研究，亦是從問學於葉老師開始。幸蒙老師不棄，錄為弟子，剴切指導，終能完成博士論文。

就讀博士班期間，在戴璉璋老師與黃沛榮老師的指導下，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進行「歷代易學雜著資料庫」的文獻蒐集及標點整理工作，其後點校《劉文淇集》、《劉毓崧集》等書，均是文獻知識的具體應用。

本論集除〈序言〉及「附錄」外，收錄論文十二篇，其中幾篇為就讀研究所期間撰寫的習作，承蒙師長厚愛，薦刊於學術期刊中。其餘為近年來的撰述，均於學術期刊或研討會發表，研討會論文亦經過審查後收錄於會議論文集，茲說明如下：

一、《漢書·藝文志》成書淵源論疑

《亞東學報》第 28 期，2008 年 12 月。

二、《漢書·藝文志》著錄義例考辨

《第八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

錄。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2012年10月。

三、《漢書·藝文志》未立史類之緣由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13期，2010年3月。

四、「數術」與「術數」之名義辨析

《輔仁國文學報》第30期，2010年12月。

五、《漢書·藝文志》述論之西漢學術

《第三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2000年5月。

六、劉向的校讎工作對經學儒學的影響

《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15期，2011年3月。

七、古代藝術觀念與唐宋書目藝術類的內容

《國家圖書館館刊》民國99年第2期，2010年12月。

八、《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十三經注疏》提要疏議

發表於「典籍·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3年6月。

九、《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論中國詩文評著之特性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2卷2、3期，1996年6月、9月。

十、乾嘉時期之輯佚書與輯佚學

《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10月。

十一、鄭玄《六藝論》輯本十種合駁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4卷1期，1997年9月。

十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述論

《國家圖書館館刊》民國86年第2期，1997年12月。